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历史经验、 现实约束和战略选择

李青, 韩永辉, 张双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随着全球价值链重构加速,各国相继出台竞争性产业政策,以推进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位势攀升。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过程中,虽有大国赶超的历史经验,但全球化纵深发展催生出不同于以往的现实约束,亟待思考破局之道。基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历史实践,通过文本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研析当前治理环境的约束特征并提出战略选择。研究发现,直接参与工业现代化进程、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专攻全球价值链特定环节和对标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有助于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但全球价值链科技藩篱高筑、纵向分工萎缩而横向竞争加剧、协调机制失衡和缺乏治理共识等现实约束阻碍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进程。研究表明,中国亟待加强国际科技创新治理、聚焦价值链重点产业治理、统筹国内外平衡治理和深化区域合作协同治理。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产业结构;中国方案;产业竞争;全产业链;产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3)02-0036-17

Historical experience, realistic constraints and strategic choices i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LI Qing, HAN Yonghui, ZHANG Shuangyu

(Guangdon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收稿日期:2022-10-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085,21&ZD07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3041,72073037);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2B1515020008);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点实验室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2022年度特别委托项目(GD22TWCXGC12)

作者简介:李青(1969-),女,湖南长沙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管理学博士。

通讯作者:韩永辉(1986-),男,广东佛山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ed reconstruc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countries have introduced competitive industrial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chains and the ascension of value chains. As an emerging economy and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a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atching up with economic giants while maintaining free trade and multilateralism. However, the deepene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has given rise to unprecedented realistic constraints, which require urgent solutions. Based on China's historical practice of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aint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governance environment and proposes strategic choices through textu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research argues that China can deeply integrate itself into global value chains by directly participating in the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specializing in specific link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benchmarking against the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of global value chains. However, four realistic constraints, e. g. high technological barrier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shrinking vertic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creasing horizontal competition, imbalance in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lack of governance consensus, have hindered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China urgently needs to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focus on the governance of key industries in the value chain, coordinate balanced governanc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eepen synergistic governance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industrial structure; Chinese solution; industrial competition; full industry chain; industrial strategy

全球价值链的演进对于世界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世界各国依托产业政策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动态治理的同时,国家间权利博弈和利益拉锯也发生重叠或冲突^[1]。同时,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以全球价值链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生产分工网络也正处于深刻变革之中,以国家力量为支撑的全球产业升级、脱钩和整合竞争日趋激烈^[2]。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的国家治理职能亟待发挥效用,中国作为后起新

兴大国和全球价值链的枢纽国家,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对于进一步深化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和推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

世界经济发展的阶段转换使得大国之间的竞争领域与形态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同时,国家发展阶段也是影响主体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从而使得发展阶段相近的国家之间表现出更为显著的竞争关系^[4]。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带有扩张型产业

政策,以期通过产业政策战略治理来抢夺全球价值链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5],这种大国对领导权的价值判断分为双重独占、全球优先、地区优先和双重分享4种类型^[6]。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继续提升,且超过美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经济体主要上游供应国,全球价值链供应优势增加的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7]。随着中国同世界主要经济大国间的经贸合作和利益博弈加剧,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中欧协力推动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①以及中日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均是力量博弈的结果,全球价值链治理也必将在大国竞争之中展开,大国竞争的核心是产业政策的竞争,而全球价值链竞争的本质是产业链的竞争。

国家力量已成为运用产业政策实现全球价值链治理的重要力量主体。全球价值链治理已超越企业间以及企业与国家间的能力范畴,带有国家利益性质的全球价值链局势变革频繁^[8]。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不仅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现实之要,更是维护和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之需。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有助于中国突破“低端锁定”和跨越“大国赶超陷阱”,对更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完善政府治理职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一,“低端锁定”桎梏中国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亟需国家治理能力发挥效用。中国遵循“先融入,后升级”的路径逻辑成功完成了新兴经济体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进程,随之充分发挥“学习效应”以实现提升本国产

业技术水平和企业管理能力的目标^[9],但是通过依附性嵌入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存在被长期“低端锁定”的风险^[10]。在改革开放初期,受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资源的制约,中国经济发展依靠“人口红利”实现“原始资本”积累,随着新时代中国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征程,科技自立自强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支撑,而国家力量参与的产业政策是科技实现自立自强的重要保障。

第二,“大国赶超陷阱”威胁中国和平崛起,亟待政府充分发挥治理职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和苏联的经济实力都曾接近美国甚至呈赶超之势,但最终都没能在大国竞争中成为赢家,并落入了“大国赶超陷阱”^[11]。2020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达14万亿美元,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1%^②。中美贸易摩擦不仅拉开了中美两国在关税壁垒和负面清单审查制度等方面博弈,也开启了中美在全球价值链规则制定、利益分配和权利转移领域的治理博弈^[12]。中国作为多边主义转型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已积累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13]。在秉持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多元化和多边主义架构下,中国的参与对于深化以多边主义为发展动力的全球价值链治理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被动承载“他国矛盾转移”冲击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亟待国家治理力量斧

① 德国作为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时期的欧盟委员会轮值主席国,在组织和协调此次双边谈判以及促成谈判成功的过程中起到显著积极作用,现阶段谈判进程虽处于停滞状态,但谈判文本的法律程序仍在双向推动中。

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

正御外。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发展意志同被过度剥削剩余价值阶层的反抗意志相矛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发展停滞、倒退、甚至崩溃,而将经济通胀滞胀、泡沫空心产业和意识形态矛盾以间接代理殖民和直接转移稀释的方式转嫁于盟友或对立竞争者是短期内可行的有效方式。譬如,中美贸易摩擦是美国将国内冲突的靶向转到中国,以创造外部威胁的方式来达到短期缓解国内矛盾压力的目的。但从利益集团概念视角来看,贸易顺差虽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则在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位势分布中,中国仍处于中低端,赚取加工组装费,而美国处于高端,获取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的利润,贸易顺差仅为贸易量层面的计量,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高附加值产业可赚取相对高利润、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低附加值商品则惠及美国消费者。总体来看,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位势的有限治理能力是中国防范、化解和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不够强大的症结之一,亟待国家力量在抢夺全球价值链治理权中提速增效,以维护自身发展安全,并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

基于本文的研究问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演进过程中有何历史经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经贸摩擦频繁和产业竞争加剧使得全球价值链发展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负外部效应给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带来了何种现实约束?面对来自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的扩张性产业政策的竞争冲击,中国应选择何种战略路径以充分发挥中国智慧来打破桎梏中国参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现实约束?

一、文献评述和概念界定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学界对于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产品链所赋予的学术内涵各有侧重。国内研究热衷于使用“产业链”这一学术词汇,国外文献多聚焦于价值链研究,而对产业链的研究分散于细分领域。价值链起源于对单个企业内部的研究,企业通过基本活动(生产、销售、物流和售后等)和辅助活动(人力资源、原材料采购和技术研发等)所形成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而产生的企业创造价值链条即为价值链^[14]。从价值创造维度来看,价值链由各创造并产生价值的环节串联而成,是一种以追求产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以满足终端用户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投入产出盈利为机制的产业组织系统。从产品制造维度来看,产品链是以产品工艺分工和功能分工为基础逻辑,按照工艺和功能将生产过程分割并配置于不同国家,企业专注于生产特定环节,而不生产整个产品^[15]。相比产业链是经济学概念,供应链是管理学概念,更强调企业层面的原材料、元部件供应网络管理,其基本表现形式为对原材料、技术和劳动等生产要素进行最优配置以实现供应成本的最低化^[16]。

总体而言,价值链、供应链、产品链是内嵌于产业链当中的子链,价值链侧重价值创造,供应链关注企业层面的原材料供应,产品链偏重于制造工艺和功能属性,而产业链注重整体竞争力,即要求创造价值又偏重制造创新,同时强调供应安全。显然这些“子链”的研究涵盖于产业链研究,而有关价值创造及其

最大化、价值分配及其合理性的问题则是其核心共性问题。从最新研究来看,学界有把产业链和价值链联合做产业价值链研究的趋势,研究视角聚焦于产业价值链的接通和延伸。

全球价值链是一种独特的非对称网络形式,价值创造、成本节约和生产效率构成其关系动力的重要因素^[17]。有关全球价值链治理即为价值链中权力拥有者,通过发挥协调和组织职权,使得分散于各地的价值创造活动以实现效益最大化配置的管理行为^[18]。长期以来,全球发达国家中的领先公司扮演着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角色^[19],而东道国制度质量差异对跨国公司采取何种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以及治理效率的高低有着显著影响^[20]。其中,产业政策是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核心因素^[21]。各发达国家以产业政策工具应对来自产业竞合的价值链中的权利分配不均和利益分配不均,由此催生了全球价值链治理的诉求。现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产业多元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加快,随之而来的产业竞争加剧、产业链缩短和价值链网络创新乏力,全球价值链治理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题中之意。

产业政策是价值链治理的直接手段和有效路径,是国家意志、市场逻辑和国际博弈的综合治理方式,在创新技术、智能制造以及利益分配等领域具有极强的竞争属性。纵观全球各国抢占治理话语权、行为能力主控权的博弈历程,国家产业政策、全球性国际组织、跨区域联盟和对外援助等已成为主要治理竞争手段和实施工具^[22]。而其中,产业政策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支撑点和发力点,是主导竞争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自第一次工业革

命爆发以来,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必经之路,而工业化的过程离不开产业政策^[23]。在全球化时代下,先进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塑了全球产业结构,随着大国竞争的本质逐渐转化为产业政策的竞争,产业安全在国家安全布局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24]。由此可见,产业政策是驱动全球价值链治理得以启动运作的核心引擎。

二、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历史经验

一国经济越是落后,其开启工业化的进程就越缺乏联系性,越注重生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的生产,其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配置和执行措施也越带有集权化和强制性特征,其制造业越有可能飞速发展,推动经济跨越增长。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初期居于低附加值位势,多围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秩序而直接开展国家现代化工业进程,通过吸收先进经验,深耕优化本国比较优势产业,实现经济高速发展。

(一) 跨越全球价值链构建初期,直接参与现代工业进程

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即是被动卷入由发达国家构建的全球价值链,而后主动推进全球价值链建设的过程。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突破以低成本生产要素为比较优势通过加工贸易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为国内经济发展聚势蓄能(图1和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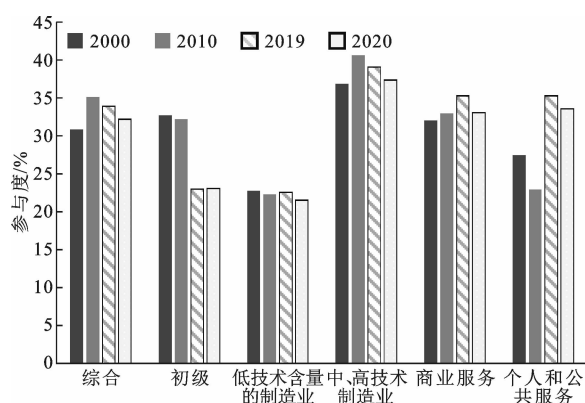


图1 2000—2020年中国各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情况

注:基于贸易的统计,数据来源于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Database,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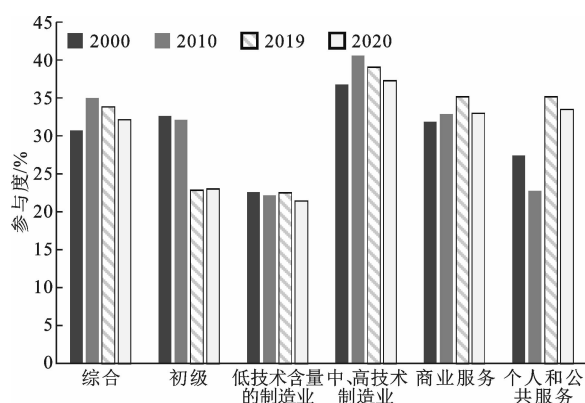


图2 2000—2020年中国各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情况

注:基于产出的统计,数据来源于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Database, 2021。

第一,以加工贸易为切入口融入全球价值链,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在经济全球化初期,相比于英国、美国和德国等世界经济强国具有的先发优势,中国工业化基础薄弱,全球产业竞争力不足,经济实力有待增强,在推动工业化发展方面略显乏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正逐步成型,德国和日本作为美国控制欧亚大陆的节点国家与美国同属世界等级划分的中心地带^[25],而中国作为发展中

国家则处于全球价值链外围地带^[26]。中国以“人口红利”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以加工组装贸易开启工业现代化建设,在西方发达国家构建的全球价值链机制下参与国际分工。

第二,破除全球价值链门槛桎梏,以发达国家经济秩序共识为背景构建产业间国际分工制度。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开启“引进来”“走出去”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定的制度支撑,但在此之前中国明显缺乏对接国际经贸活动的能力,在构建和主导全球价值链体系方面知之甚少。世界各发达国家凭借本国的产业优势建立起全球商品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并进一步形成全球价值链体系,这在扩大价值链主导国家财富增长的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后起追赶提供了可行路径和现实方法。中国得以破除被排挤在全球经贸体系之外的不利困境,直接化被动为主动地参与以发展中国家构建的全球价值链体系。

(二) 吸纳价值链发展先进经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国通过吸收借鉴全球价值链主导国家的先进成功经验和历史失败教训,充分利用知识溢出效应和技术模仿效应,不断积聚研发成本优势和风险把控优势,从而加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追赶。

第一,充分发挥知识溢出效应和技术模仿效应,通过吸纳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成功实现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创新发展。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初期阶段更多的是按照主导国家的意愿和

决策来灵活性地推进本国产业发展,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合作更多的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动地位的互利合作。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外迁、低端产业的生产和销售都需要巨大规模的劳动力人口和消费人口来承接,发达国家需要像中国这样能够提供低成本生产要素的人口大国和资源大国来为其外迁的产业经营提供生产和消费的空间。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转接低端产业到中国市场的同时,势必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能,有助于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中的原始积累,实现国家在产业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方面的价值链位势跃升。

第二,合理利用研发成本优势和风险把控优势,通过吸纳借鉴先发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危机教训,反观内省自身优劣以预判不确定性风险和潜在机遇。通过观察先发国家的全球价值链战略路径及其实施效果,从而预测性研判本国全球价值链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可规避风险,以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为基础采取相应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战略方针。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初期,中国科技研发基础薄弱,抗击外部风险和全球危机的韧性不足,而全球价值链先进国家的实践案例为中国后起追赶提供了科学研究发展方向和不确定性风险范式,从而促使中国在先进国家推进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基础之上集聚了研发成本优势和风险把控优势。

(三) 专攻全球价值链特定环节,充分发挥产业比较优势

中国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要素禀赋作为比较优势以嵌入全球价值链,经过长期的积累之后,现阶段正处于由“微笑曲

线”^①中低端向高附加值的两端攀升阶段。从加工组装到基础设施建设,从土地外租到海外建厂,从低端制造到高端服务,中国通过专攻全球价值链中的某一特定环节使得自身产业深入嵌入全球经济发展之中,并以此为动力充分发挥产业相对比较优势,从而不断实现自身产业升级。

化被动“低端锁定”为主动“低端赋能”,深耕全球价值链基础根本性制造供应环节。在全球价值链发展初期,中国以加工组装分工环节奠定全球核心制造大国地位,显著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中国依据自身国情,深刻践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鲜明国策,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加工装配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不断扩张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凭借基础生产制造供应优势以成为他国中高端产业发展不可缺少的核心支撑。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不仅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也是全球产业发展的受益者。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上,中国凭借基础产业支撑实力和低端制造相对优势已超越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先发优势国家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深耕加工制造分工环节实现几乎全球所有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世界工厂”供应商角色不断坚固的同时其“世界市场”需求方角色也日益凸显。以低成本生产要素为比较优势承接发达国家低附加值产业外迁和经济要素全球配置所带来的资源外溢

^① 1992年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提出了有名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理论,主要内容是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

效应,成功实现以人口红利、土地租赁优惠以及外商投资福利等互惠政策,为中国初期参与经济全球化路径的全球价值链“低端赋能”。中国凭借低成本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比较优势成功融入全球价值链,后以加工组装和分销售卖的方式占据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特定生产工序和环节。

(四) 对标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加强顶层设计实践引领

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建立后再加入的“新兴选手”,虽未参与分工模式、规则和评估等体系框架的制定,但在本国工业基础薄弱的背景下具有借鉴参照作用,对标革新的参考优势,能够有的放矢地对标先发达国家建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工业现代化初期以先进经验为指导推动自身工业分工体系初级模型的快速建立。

第一,对标先发达国家高附加值价值链布局体系,革新国内经济发展模式。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以追求质量为先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和从要素驱动向创新和效率驱动的转变成为中国自我革新的重要体现^[27]。在全球价值链构建的初期,先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巨头已经凭借其强大的竞争力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位势的市场份额,在这样的世界市场背景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价值链占位上虽对于较发达国家而言处于相对低附加值位势,但仍能凭借先天发展要素禀赋成功实现对先发达国家的快速赶超^[28]。

第二,研察占据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位势先发达国家产业布局,加速构建以新发展格局

为指导的国内价值链。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出台的产业政策的扩张性竞争属性极强,使未来全球竞争的关键点落到产业政策的博弈上,中国以对照先进国家产业政策的动态变化进而机动研判全球产业链发展走势,从而依据本国国情和国际局势不断调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产业分工布局,以“双循环”格局彰显中国智慧和方案,致力于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革新,依托国内顶层设计加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政策引领,进而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厘清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路径逻辑。

三、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现实约束

全球价值链纵向分工萎缩而横向竞争加剧,效率和韧性之间的协调机制失衡,价值链秩序重构背景下各国治理力量角力不断,治理权利归属和治理规范制定的国家间博弈意愿陡升,代表性、制度化和执行力是阻碍全球治理发展的矛盾制约因素,共识范式和一致目标的缺失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现实约束。

(一) 全球价值链科技藩篱高筑,引发规则主导权拉锯战

全球科技创新的治理理念、治理环境和治理标准分歧逐渐扩大,大国间话语权、主导权和领导权博弈日益激烈,进而引发全球科学技术规则制定的拉锯战、持久战和僵持战。

在治理理念方面,科技创新泛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特征愈发明显,国家意志和

政府力量在全球科技价值链治理中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不断扩大。缺乏共识、各自为政的全球科技价值链治理观已超出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范畴,严重削弱和束缚全球科技创新链、价值链和产业链的接通和延伸。譬如,美国国务院制定所谓的《电信网络和服务的安全性和信任标准》,构建“技术联盟”封锁遏制中国发展,所提出的“布拉格提案”和“清洁网络计划”充斥着反映美国意识形态要求和政治化条件,并以期通过数据治理打压国外竞争对手^[29]。

在治理环境方面,国家对科技数据资源监管控制力度加大,数据跨境流通受限门槛提高,有悖科学发展规律。科技数据成为科技创新发展的“土壤”,对数据生产要素的极高依赖度意味着数据资源的存取安全、可得渠道和应用机制已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科学技术创新链接和延伸的关键决定因素。经济逆全球化浪潮抬头、全球价值链秩序重构、国家力量更迭以及不确定性风险增加等因素导致世界各国对于数字资源和数据要素的管控力度和警惕意识骤增,“被赶超”的危机感和“被遏制”的压迫感相互作用,致使科技发展偏离“创新升级”的科技发展规律,不利于全球科技协作共赢且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譬如,欧盟已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等文件进一步提升对于企业和市场数据的本地化保护,并且带有针对性防范监督外资企业渗透或并购本地战略性新兴企业及产业。

在治理标准方面,各国科技领军龙头企业仍然占据标准制定的主导地位,关于科技标准的全球性组织缺位,以企业利益为驱动

力的科技标准忽视全球科技发展的整体性利益。各国互异的科技标准,多重叠加的科技法规章程和交叉复杂的科技政策对科技产品链和科技创新价值链的接通、延伸造成极大阻碍,进而桎梏科技市场的全球化发展和科技经济功能的充分发挥。

(二) 全球价值链纵向萎缩加剧, 横向动态竞争日益激烈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全球价值链纵向分工规模渐趋缩短,而横向生产网络趋于本土化、区域化和碎片化^[30]。此外,各国产业政策的出台使得以产品内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的治理难度加大。闭环式全覆盖产业链建设加快,全方位扩张型产业战略布局凸显。面对世界不确定性增多和国家间博弈加剧,英美德关于全产业链建设的意识不断加强,保障国家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成为三国产业政策的共同点。英国、美国和德国都在加快打造本国的全方位、全覆盖和全自主的产业供给链模式,其产业布局战略日益显著(图3)。但出于各自全球产业链分工位势、资源要素禀赋和产业竞争优势的差异性,各国在打造全产业链模式大方向下,中微观产业布局也各具特色。

英国致力于构建全附加值产业链模式,服务业和制造业全学科和全流程横纵产业布局凸显。英国在其产业政策中着重强调创新理念,致力于成为全球创新领先国,在世界领先水平的学科研究基础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背景之下,提出构建从横向层面打通学科之间的联动附加渠道,从纵向层面实现流程的全要素多层次高效率的协作创新格局^[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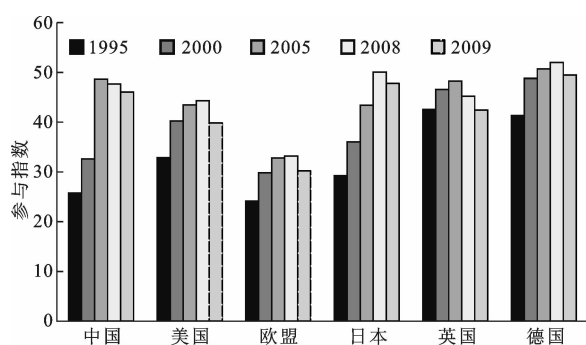


图3 1995—2009年世界各国全球价值链

参与指数变化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英国产业政策的目的在于创收,即要扩大企业的盈利也要提高国民收入,产业发展的附加值因素是其产业布局的重要考虑因素,通过创新促进产业升级,以升级开拓新兴市场,从而推动企业高附加值生产经营和居民工作收入水平的提高。

美国力主建设全产业链模式,推行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的产业战略。《美国工业》提出,提升国内制造业供应能力,实现制造业,尤其是军工制造业的产业全覆盖,打造美国生产和美国购买的全产业链模式。基础制造业和国防工业之间的协同稳定是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保障,基础制造业的回归更强调其创新性、先进性和自主性,主要措施有3条。一是建立政府和企业的公私伙伴关系,提升中小企业的市场地位,将国家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转让给中小企业以推向市场,实现科研成果的高效商业转化。二是实现军民两用技术的市场共享,开放军民两用技术以实现国家军事工业制造由本国企业承担,以减少对外国企业的军用采购依赖。三是实行有条件的企业扶持政策,对于自愿回流本土的企业加大政府采购力度,给予减税降费优惠

支持,以打造美国生产和美国购买的全方位产业布局。

德国强推打造闭环工业链,增强扶弱产业布局进程加快。《战略2030》提出打造“闭环工业链”,这符合德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诉求,面对新冠疫情、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抬头等世界不确定性因素,对外敏感度较高的德国产业链亟需实现独立自主以抵御外部冲击。“闭环工业链”致力于将原材料的生产、加工、销售和研发等环节都集合于本国工业体系之中,形成国内供给循环网络,以减少因新材料和新技术缺失而导致新兴产业培育受制于人的外部威胁,其中改善数字新兴产业孱弱困境是德国工业发展的首要目标^[32]。在对现代新兴产业给予政府扶持和资源投入的同时,德国也同步加强传统优势产业的巩固提升,以期既跨越“能力陷阱”又突破“数字鸿沟”^[33]。

英国、美国和德国的扩张性产业政策竞争加剧,不断激起全球价值链产业政策博弈。比较研析全球价值链先发国家产业政策,对于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过程中的战略制定来说不可或缺(表1)。

(三) 全球价值链协调机制失衡,效率和韧性间张力渐增

全球价值链协调发展机制失灵,效率和韧性之间的张力逐渐加大。基于全球分工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是依附于全球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和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得以实现的。全球生产网络的灵活性是全球价值链实现高效率生产、加工和销售的重要保障,但受世界经贸摩擦不断,各相关国家政治局势动

表1 英美德产业政策主要内容和目标

国家	时间	主要产业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和目标
英国	2017	《产业战略:建设适应未来的英国》(<i>Industrial Strategy: building a Britain fit for the future</i>)	打造人工智能和数据驱动型经济和未来领先世界的移动交通运输网络,实现向绿色增长的转型以及利用创新的力量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求。
美国	2019	《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i>America Will Dominate the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i>)	以“对内扶持,对外打压”为理念,旨在恢复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保障就业,继续维持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① 。
德国	2019	《国家产业战略 2030: 对于德国和欧洲产业政策的战略指导方针》(<i>National Industrial Strategy 2030: Strategic guidelines for a German and European industrial policy</i>)	以夺回“工业和技术主权”为目标,旨在“增强扶弱”国内产业部门,加强德国与欧盟双向产业联动发展,力保德国工业在全球的竞争优势。

注:资料是作者根据英美德政府网站发布资料整理而得。

荡以及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巨大外部冲击,全球价值链的效率遭受重创^[34]。

第一,国家间贸易摩擦加剧叠加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导致全球价值链的分散,生产网络和各国互联协作渠道受到巨大外部冲击。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催生出更高关税壁垒、更严苛负面清单审查机制以及非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产生,这对全球价值链效率和韧性之间的平衡提出较大考验。主权国家或跨国企业部署全球价值链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的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全球部署在提高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上又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产业资源调整的灵活性,使得价值链的效率和韧性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对立相悖关系,而这正是全球价值链治理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第二,外商投资审查机制日趋严格,本国私人投资门槛放宽。警惕外商投资和鼓励国内私人投资已成为英美德国家的投资特征,各国在招商引资的同时也更加注重涉及国家

安全的战略性企业部门的排他性保护。英国侧重于改善投融资条件,通过政府基金和银行运作为初创企业提供资金配套支持,在此基础上呼吁本土私人资本的进驻。美国更加注重投资规则的自我革新和司法评估,关键基础设施和军工制造已成为美国防范外来投资的重点审查范围。2018年8月13日,经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签署的《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正式生效。德国政府对于外商投资的敏感度亦显著提高,保护本国新兴初创企业已成为国家基金重点履职任务。2018年12月19日,德国政府通过外商投资制度修正案,该修正案于2019年1月生效。英美德三国对外商投资的警惕程度不断提高,未来全球投资格局日趋表现为投资协定国间的定向投资往来。

(四) 全球价值链治理缺乏共识,治理话语权博弈加剧

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繁复,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新的产业政策,各国对于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参与权、话语权和主导权的竞争越发激烈,全球协同治理难度不断加大。

从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的产业政策可以看出,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日趋增强,扩张性产业政策浪潮不减。英国政府角色趋向于稳固经济发展、提升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盈利、改善民生福祉。英国曾是最为积极践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但近年来产业政策的回归表明英国政府角色有向新李斯特主义过渡的趋

① *America Will Dominate the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2019-02-07, 美国白宫官方网站, 参见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america-will-dominate-industries-future/>。

势^[35]。《产业战略》发布于英国“脱欧”后不久,政府依托创新来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改善民生福祉,使英国经济能在脱欧后的过渡期内平稳运行。

美国政府角色趋向于优先霸权管辖、巩固全球领导、保障国家安全、加强国防工业。美国对外经济制裁和霸权管控措施不断,其挑起的贸易摩擦争端和世界和平冲突使得昔日的绝对霸主国际威信有所下滑。美国深谙先进军工制造业和其全球霸权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泛政治化手段,意在通过军事强权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

德国政府角色趋向于主动革新战略、积极干预经济、局部贸易保护、双向联动欧盟。面对全球扩张性产业政策加剧和传统强势产业优势不再而新兴产业竞争力不强的内外交困局面,德国出台了极具革新色彩的《战略2030》,提出不同于以往产业创新政策的极具贸易保护主义的产业发展布局,挑选10个优势领域和7个弱势领域进行重点扶持,建立“国家基金”以投资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企业,以及要求欧盟修改相关的竞争法案以降低限制德国乃至欧盟内企业强强联合的门槛。

四、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战略选择

中国已成为全球治理改革的有力推动者和实践者,致力于推进在权力、话语和具体方案3个维度上改革创新的分工与协调^[36]。从国家层面来看,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更多体现为有别于公司治理和国际贸易体系治理的

政治属性。主权国家将全球价值链治理视为政治事项,其目标是颁布实行有助于企业更好参与和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政策^①。通过上文对比研析英国、美国和德国的产业政策,进而研究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先天优势和现实约束,有助于深刻理解先发国家布局全球价值链的政策动向和产业战略,并由此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提出4点对策建议。

(一) 加强国际科技创新治理,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协作

长期以来,美欧等发达国家掌握着技术标准的制定权,并享受其衍生出来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中国科学成果的研发突破也因此受制于关键技术壁垒,而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优化升级^[37]。例如德国和荷兰等掌握先进技术的少数欧洲国家对中国港澳大桥沉管技术要价高企、美国对于华为和中兴的技术封锁等案例都说明,中国自主自立自强科技创新的是突破外围阻碍封锁的有效路径。数字技术已成为颠覆世界产业格局和革新全球生产分工秩序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优化数字科技的战略布局有助于中国数字产业的更好发展。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其中技术创新是最为关键的,同时也是相对短期内最易模仿和引进的^[38]。加快推进中国自主研发“卡脖子”战略性核心技术研发,不断优化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格局,下好科技创新

① Who Governs Global Value Chains? 2016-08-16,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网站,参见 <https://www.cfr.org/blog/who-governs-global-value-chains>。

“先手棋”,以掌握核心竞争技术为支撑,加快推进国际科技规则在多边共识框架下的制定和建立。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在医药制造、运输装备和化工产品制造等领域应加快自主创新^[39],以不断加强价值链位势提升动力。同时,重视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交流,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发起全球性科技创新发展课题并主动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二) 聚焦全价值链重点治理,充分发挥潜在竞争优势

中国具有相对完备的全套价值链,因此能够瞄准重点战略性产业的规则制定和框架监督,发挥中国巨大市场规模竞争优势,深挖产业配备齐全的潜在价值。此外,中国拥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和活跃的资本储备,能够承载英美德等国的商品和服务的出口需求,以及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经贸流通体量。同时作为贸易顺差大国,中国可适度利用财政空间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对外援助和制度服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借助人口红利和市场规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开启价值链网络的构建进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的交互联系愈加紧密,利益挂钩和经贸互补的程度不断提升,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话语权和合法性显著增强。

第一,加快构建全套价值链中的优势产业包容或排斥门槛,从营商环境、制度规范和经贸流程入手,运用政府力量以税收、产业和经贸等政策,加强对中国主导的部分全球价值链的进入模式、运行方式以及行业制度进行治理。中国商业环境优良,不仅是全球价

值链的前端销售出口市场,也是后端的消费进口市场。中国与美国、英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的经贸联系紧密,利益交织网络坚固。中美贸易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商业环境调查2020》报告显示,超九成在中美国企业保持盈利且明确表示不会放弃中国市场。2020年,中美货物贸易总额超5 8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8%^①。中国是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德国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虽面临诸多挑战,但双边的利益诉求和互利合作共识是加强双边经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发挥中国市场规模优势,挖掘中国配套齐全的产业链深层价值,是推进中国同发达国家互利合作的有效路径。

第二,加强对全球价值链中中国薄弱产业的资源投入,以人才、资金、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的投入来降低中国对外价值链的依赖度。但要注意个别西方国家恶意捏造的舆论对国际市场预期的影响,以保证中国价值链网络的正常发展。价值链依赖度和外资保护机制间有着显著替代效应,价值链依赖度的提升有助于外资抵御政治风险^[40],因此需要平衡价值链对外依赖度,确保吸引外资和利用外资的市场机制平稳运行。中国价值链完备但仍存在薄弱产业环节,需以优势产业挂钩带动薄弱产业发展,推进技术升级和管理引进等方式加强薄弱后发产业的转型升级。

中国具有相对完备的全产业价值链配套,有能力也有条件承担更多的全球价值链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官方网站。

治理责任,为全球其他国家提供稳定的价值链供应,而职责范围扩大的同时需要更多更广的治理职权,以维护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多元化发展。

(三) 统筹国内国外平衡治理,维稳政治安全经济利益

针对治理主体及其权责不明,治理模式繁复而导致的全球失衡这一长期性问题,学术界一般或是基于现有国际框架对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进行改良,或是抛开旧有模式来探索全新的全球治理方案^[41]。中国应继续坚持对内自主改革、对外全面开放的国内外统筹局势观,推动新发展格局的稳步建设,在牢筑国内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上敢于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范式,勇于宣传经过历史检验的中国经验、勤于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随着全球经济低迷和新冠疫情不确定性加大,全球价值链中的供应商越来越多地采用多链战略,为全球南北双方的买家提供服务^[42]。全球价值链的多链战略在英美德产业政策中体现充分,多链战略可以加强产品多样化和提高经济回报,促进经济升级。英国、美国和德国对于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发达国家产业布局中的政府力量将在经济领域持续增强。英法德各国政府将数字化智能化工业摆在战略核心地位,其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参与度不断提高。英法德政府经济角色的加强折射出发达国家政治经济模式走向,中国应继续维护自由贸易秩序。

第一,探索全球价值链治理新范式,打破现有国际治理制度框架束缚。加快构建适应

现代世界各国产业发展格局的现代化全球价值链治理框架,巩固夯实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全球产业融合和自主创新基础,防范化解先发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深入落实以国内需求为经济内生动力引擎的国内供应、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和消费全覆盖模式,以内需水平的提升促进国内企业、行业和产业在价值链位势的升级,从而破除外部环境所形成的价值链“低端锁定”。

第二,厘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价值链演化进程的现实发展逻辑,求同存异寻找优势互补锚点。发达国家对未来产业格局变化和世界产业价值链重塑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有所增强,发展中国家则更加积极主动推动产业结构变革和世界产业价值链重塑。从北美、西欧等经济体对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崛起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秩序变化和全球价值链重塑的不适感和抵触情绪日益增加。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面对外部不确定性加大带来的风险,需采取更多的防范措施,为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稳定做出自身应有贡献。

第三,研析发达国家价值链发展趋势,结合各国家产业政策研判全球产业价值链未来布局特点。国际发达国家或将加快回收或转移本国海外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加快从“微笑曲线”的中部低端位势向高附加值的两端攀升。英法德各国产业政策均提出维护全方位闭环工业增值链,其海外产业链或将变短回溯。英美德等国为遏制中国崛起已开始转移或回收其海外劳动密集型产

业生产链,回收的目的是重塑本国“微笑曲线”上中下游全产业链,为高新技术发展提供坚实制造业基础,转移的目的的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对中国供给链的依赖,另一方面是为了寻找新的“人口红利”。

(四) 深化区域合作协同治理,提升国际对接互惠水平

区域和政治一体化与风险分担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效应,经济因素虽是价值链治理的关键因素,但也不可忽略政治因素在推动风险共享机制形成中发挥的显著作用^[43]。推动制度化的多边合作,秉持多边合作原则推进国家间区域合作,以此提升全球价值链治理执行力。从上海合作组织,到金砖国家,再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可以看出,区域性协作对推进区域深度合作、治理制度协同的新机制具有重要积极意义。在国际发展领域,中国以“一带一路”为治理创新试验区,开展了大量包容性治理方案创新和试验,促进了中国同国际社会的碰撞与融合^[36]。再定位中国接轨全球性治理组织的新角色,探索东西方产业价值链分工的新格局,以战略自主和多边合作为原则推进泛制度化的多主体协同共治模式。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无端警惕日益提高,国家间的战略博弈不断加深。美国、英国和德国产业政策均指出应更加主动有力地应对来自中国、美国等外部力量的挑战,中国同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关系未来发展博弈加剧。英美德三国产业政策均提出政府干预和国家补贴,改革举措具有明显的保护性、排他性和竞争性,其对标全球竞争、增强政府经济干预力量的意图明显,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思

想抬头。上述三国的企业私有化、去市场机制、税收补贴、降低社会福利、缩减国家支出等经济政策均表现出去全球化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趋势。英美德政府角色转变的坚决性和产业发展战略的针对性均表明其维持和巩固本国经济地位的迫切意愿。自2016年以来,中国企业在英美德等国的投资并购项目受到其政界、商界和社会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无端阻挠,中国现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间位置,美国仍处于全球创新链高位,德国和英国凭借各自的特色产业优势处于中上位置,中国的崛起令英美德老牌强国感到焦虑^[44]。然而,中国同英美德国家的传统产业结构互补性基础未改变,总体经贸合作利益契合面更大。虽然中国和英美德国家都在加紧部署高科技领域,但是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互利合作基础仍然坚实可靠。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加强中国同英德法国家的利益合作,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五、结语

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不仅是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冲突升级的产物,更是国际社会无政府主义状态下逆全球化浪潮回溯的表征。明晰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历史实践,探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面对的全球价值链治理约束,研析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战略选择,是进一步拓取中国特色全球价值链治理成效的必由逻辑,而高科技创新治理、重点战略产业治理、国内外平衡治理和区域合作协同治理亟待加强。

参考文献:

- [1] 何宇, 张建华, 陈珍珍. 贸易冲突与合作: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解释[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3): 24-43.
- [2] 郭周明, 裴莹. 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典型事实、理论机制与中国策略[J]. 改革, 2020(10): 73-85.
- [3] 洪俊杰, 商辉. 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共轭环流论”: 理论与证据[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1): 42-64.
- [4] 王玉柱. 发展阶段、技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格局调整——兼论大国政治驱动的新区域主义[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11): 136-155.
- [5] 任琳, 黄宇韬. 技术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国家与市场逻辑的博弈[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5): 131-153.
- [6] 顾伟. 领导权与大国欧亚地区竞争的演化[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10): 79-104.
- [7] 牛志伟, 邹昭晞, 卫平东.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变化与中国产业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选择[J]. 改革, 2020(12): 28-47.
- [8] DALLAS M P, PONTE S, STURGEON T J. Power in global value chain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19, 26(4): 666-694.
- [9] 刘洪钟. 全球价值链治理、政府能力与中国国际经济权力提升[J]. 社会科学, 2021(5): 3-20.
- [10] 葛海燕, 张少军, 丁晓强.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驱动因素——融合经济地位与技术地位的综合测度[J]. 国际贸易问题, 2021(9): 122-137.
- [11] 张宇燕. 跨越“大国赶超陷阱”[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1): 1.
- [12] 马涛, 陈曦. “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视角[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4): 131-154.
- [13] 郑宇. 21世纪多边主义的危机与转型[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8): 126-153.
- [14] 张旭波. 公司行为与竞争优势——评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J]. 国际经贸探索, 1997(3): 34-37.
- [15]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trading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EB/OL]. (2019-10-08) [2022-07-17].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dr2020>.
- [16] KOGUT B. Designing global strategies: comparative and competitive value-added chains[J].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Pre-1986), 1985, 26(4): 15-28.
- [17] KANO L.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8, 49(6): 684-705.
- [18] GEREFFI G. Global change, regional respons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9] 文婷, 曾刚.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地方产业网络升级研究——以上海浦东集成电路产业网络为例[J]. 中国工业经济, 2005(7): 20-27.
- [20] MCWILLIAM S E, KIM J K, MUDAMBI R, et al.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intersec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business[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20, 55(4): 101067.
- [21] 杨珍增, 杨宏. 东道国制度质量如何影响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J]. 当代财经, 2021(3): 100-111.
- [22] 郑宇. 援助有效性 with 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7(8): 135-155.
- [23] 郑宇. 全球化、工业化与经济追赶[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11): 105-128.
- [24] 雷少华. 超越地缘政治——产业政策与大国竞争[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5):

- 131-154.
- [25] KATZENSTEIN P J.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6] 李巍, 赵莉. 产业地理与贸易决策——理解中美贸易战的微观逻辑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 (2): 87-122.
- [27] 周文, 冯文韬. 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基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J]. 经济动态, 2021 (4): 27-37.
- [28] 樊纲. “发展悖论”与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 [J]. 管理世界, 2020, 36 (4): 34-39.
- [29] 凌胜利, 雒景瑜. 拜登政府的“技术联盟”: 动因、内容与挑战 [J]. 国际论坛, 2021, 23 (6): 3-25.
- [30] 凌永辉, 刘志彪. 横向竞争视角下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变动及产业升级 [J]. 江西社会科学, 2021, 41 (2): 37-48.
- [31] 张迎红. 美德英工业战略比较及对中国的影 响 [J]. 德国研究, 2019, 34 (4): 4-20.
- [32] 黄燕芬. 德国工业战略 2030: 背景、内容及争 议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9 (20): 76-91.
- [33] 凌永辉, 刘志彪. 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 概念、特征与政策启示 [J]. 经济学家, 2020 (6): 26-34.
- [34] GOLGECI I, YILDIZ H E, ANDERSSON U R. The rising tensions between efficiency and re- silience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post-CO- VID-19 world [J].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2020, 27 (2): 127-141.
- [35] 孙彦红. 探寻政府经济角色的新定位——试 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英国的产业战略 [J]. 欧洲研究, 2019, 37 (1): 68-90.
- [36] 余博闻. “改革方法论”与中国的全球治理改 革方略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 (10): 105-129.
- [37] 林毅夫.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 教授商榷 [J]. 经济学 (季刊), 2003 (3): 989-1004.
- [38] SONG Y, YU C, HAO L, et al. Path for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con- struc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s [J].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21, 65: 101486.
- [39] 王帅, 庞珣. 全球价值链与对外投资的政治 风险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 (8): 134-154.
- [40] 董志勇, 李成明. 全球失衡与再平衡: 特征、 动因与应对 [J]. 国外社会科学, 2020 (6): 105-116.
- [41] PASQUALI G, KRISHNAN A, ALFORD M. Multichain strategies and economic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evidence from Kenyan horticulture [J]. World development, 2021, 146: 105598.
- [42] BALLI F, PERICOLI F M, PIERUCCI E. Glo- 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isk-sharing: the rol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J]. Eu- 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8, 55: 324-345.
- [43] 顾炜. 领导权与大国欧亚地区竞争的演化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 (10): 79-104.
- [44] 张其仔, 许明.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创新 链、产业链的协同升级 [J]. 改革, 2020 (6): 58-70.

(责任编辑: 杨海挺)